



中华爱国 文学史

徐培均 主编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爱国文学史/徐培均主编. —上海: 上海社
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06

ISBN 7 - 80681 - 859 - 6

I. 中... II. 徐... III. 文学史—中国
IV. I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5960 号

中华爱国文学史

主 编: 徐培均

责任编辑: 沈 洁

封面设计: 王斯佳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com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新文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960 毫米 1/16 开

印 张: 35.625

插 页: 2

字 数: 65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 - 2700

ISBN 7 - 80681 - 859 - 6/K · 221

定价: 5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导 言

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历史。五千年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文化遗产。如何更好地继承这份文化遗产,成为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。众所周知,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,而我们中华民族,既是一个富于爱国主义传统的伟大民族,又是一个爱好文学创作的先进的民族。数千年来,中华儿女在建设祖国、保卫祖国的斗争中,不仅创造了光辉的业绩,而且还满怀豪情地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作品。这些优秀的爱国文学作品,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自强不息,奋勇向前。这一切,我们必须把它记录下来,垂之竹帛,教育后人。

但是,长期以来,对爱国主义的理论研究却很不深入,而对爱国文学的清理也显得薄弱,这一现象,跟当前高涨的爱国激情是很不相符、不相称的。就文学而言,各种各样的文学史、文学理论研究都有了相当的展开和长足的进步,但是,爱国文学史、爱国文学的理论问题,却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。这些年来,各类文学史已有两千多部;但是,爱国文学史迄今尚未见过。今天,历史使命感敦促我们必须总结历史,正确引导人民高涨的爱国激情,为此,我们特地编写了这部《中华爱国文学史》,试图弥补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。

在写作过程中,我们发现,确实有很多问题在理论研究尚未深入的情况下,很难全面展开,而且某些问题还跟现实生活有着相当的联系。诸如:何谓爱国主义?传统爱国主义有哪些特点?有哪些局限性?传统爱国文学又有哪些值得继承、歌颂、发扬光大,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?如何看待爱国文学中的民族情绪等等,这些,都是相当复杂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。这里,结合本书编写过程中的体会,谈一点粗浅的看法。

一、爱国文学发展的阶段及其特性

孙中山先生曾论述过民族之爱,他说:“……所以能结合成种种相同民族的道理,



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、生活、语言、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。”^①中山先生所列五大要素,若归纳起来,则可合为两大项:血缘,文化。血缘是凝聚的基础,文化是凝聚的内在动力。两者相互结合,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融合力,从而造就共同的语言、共同的生活习惯、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思维方式。从血缘、文化两个角度观照爱国思想发展的历程,可以发现,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,展示的正是从血缘凝聚到文化融合的爱国思想发展史,爱国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:从上古先秦到隋唐以前,可以说是民族血缘融合为主的时期;从隋唐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完善之后到晚清,可以说是华夏各民族文化相互整合、融汇,爱国思想不断走向成熟的历史时期;近代以来则是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、融合,爱国思想走向高潮的时期。在这一过程中,爱国思想也有着各不相同的表现。下面对这几个阶段的特征作些简要的介绍。

第一阶段,从上古到南北朝末期,我们称之为“血缘融合”期,可以说是爱国思想的萌芽、成长期。这一阶段,有三方面最明显的特征。

首先,“国家”的概念变化很大。最初,“国”指城邑、封地、诸侯国、邦国等,演化为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。大思想家孟子曾将这一概念进行系统化:“人有恒言,皆曰:‘天下国家。’天下之本在国,国之本在家,家之本在身。”^②“天下国家”连称,积家成国,积国成天下,很鲜明地阐述了我们今天所说“国家”的意义来源。随着“国”的内涵不断变化,爱国主义也相应地发生改变,从最初的爱诸侯“国”(如楚国的屈原)发展到对刘汉的拥戴,爱国思想中“国”的范围不断扩大。

其次,这一阶段的爱国主义与血缘有着密切的关系,但呈现出突破血缘约束的倾向。人类自有史以来,即结群而居。远古氏族社会里,部落或部族先民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(血缘认同意识的反映),可算是爱国思想的根源。从部族到部族联盟,族内婚为族外婚所代替,图腾观也有了质的飞跃,即从原来的单一氏族图腾发展到多部落图腾的融通共有,成为文化融合的最初光辉(“龙的传人”、“炎黄子孙”等说法,是时至今日仍保留着的对部落联盟时期图腾融合的礼赞)。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,禅让制为世袭制所代替,在部族联盟的基础上产生了国家,血缘凝聚力作为文化积淀,保存了下来。周初成王的“桐叶封弟”,将君权与血亲密切相连,很能说明问题。春秋战国时期,血缘的纽带呈松散状态,血亲关系为姻亲关系所取代,诸侯间的人质互换、“秦晋之好”成为消弭诸侯间纠纷的一种手段。秦汉的统一,君权的强化,血缘的作用相对较弱,但并没消失,汉高祖刘邦“非刘氏而王者,天下共诛之”的言论、吕后篡刘的失

^① 《孙中山全集》9卷《三民主义·民族主义》,中华书局1981年版。

^② 《孟子·离娄上》。



败、王莽新朝的不得人心、昭君出塞和亲、刘备蜀汉被认为正统、曹氏的代汉、司马氏的代魏遭到前所未有的阻力,都说明血缘的重要作用,此时的爱“国”思想,仍未脱离血缘的基础;但是,从发展的眼光看,又呈现出“血亲——姻亲——文化”这样的发展迹象。

再次,“正统”观渐次明显。由于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主要是以血亲为基础,因此,在血亲关系松弛、“血统”被削弱之后,天子失势,诸侯争霸,这势必要有另外一种观念来代替“血统”观。战国时期“百家争鸣”,交汇于一处就是如何统一思想,再塑有秩序的世界。一种更高层次的思想基础——文化——正在酝酿之中。官学的下放、私学的繁荣、游说之士的兴起、文化上的异彩纷呈以及文化融合最终导致的国家统一,处于中原地区的汉族,形成共同的文化基因、共同的心理素质、共同社会生活习俗,充分展示了文化的超强凝聚力。这种文化凝聚力在民族之间显示出高势能文化的优越性,于是便有了“夷夏之防”的言论,成为后来“正统”论的思想内核。汉朝建立,董仲舒强调的儒术独尊及其对“春秋”学的发扬光大,极大地促进了“正统”思想的发展,同时,“正统”被狭隘地归属于刘姓皇室,第一次与君权结合,为后来的忠君思想奠定基础。但是,两晋时期,“五胡乱华”,在民族冲突中,“正统”观又出现与君权相剥离的现象,文化融合的超强凝聚力遂显示出作用:“五胡”占有中原,结果却不得不接受中原文化,在政治制度、经济生活等各方面、各层次汉化。在民族矛盾冲突过程中,各族人民在文化上彼此借鉴,又成为新的文化凝聚的动因,丰富了华夏文化的内涵,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。一旦文化凝聚力超越了民族矛盾和冲突的层面,也就意味着更广泛、更深入的民族融合期的到来,同时,这也意味着“正统”观的再次放大和深入。

隋唐的统一,正是以此为基础的。

第二阶段,从隋唐到清中期,我们称之为传统爱国思想的“成熟期”。这一时期的爱国思想也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:

首先,民族矛盾和冲突相对激烈,同时,民族融合也更为深入和广泛。两宋与辽、金、西夏对峙,元蒙的统一,明朝的灭元,满清的人主中国,都以民族战争的形态出现。但是,此时的民族战争与此前的汉与匈奴的战争以及五胡乱华等不同。这时的民族政权虽以某一民族为主体,但绝不是单个民族间的矛盾冲突,而是民族融合体之间的冲突。辽、金、西夏、元、明、清所统治的,不再是单纯的契丹、女真、党项、蒙古、汉、满等民族,在这些王朝建立前不是,建立之后更不是。这就意味着民族融合已有相当的成效。尽管此阶段的民族冲突在今天看来,存在着民族偏见和局限性,但是,正是此一阶段的民族矛盾和冲突,又促进了这些民族融合体的进一步融合。经过元、明、清



三朝的大一统,民族融合体之间的冲突最终为民族融合的大潮所替代,并最终催生出中华多民族共同体的完整出现。诚如钱穆在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中所说:“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成一个文化机体,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。”可以说是点明了此一阶段爱国思想的实质。

其次,爱国思想中表现出强烈的忠君色彩。隋唐时期,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形式逐步稳定、发展进而衰老,封建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,在封建社会生活中起着巨大而明显的作用,成了事实上的领导核心。与此同时,门阀士族的失势、科举寒士的参与统治,使得“血缘”的根基最大程度被动摇,而大量没有血缘的寒士们所表现出来的对“君”的忠诚,最引人注目。加上此时民族矛盾相对激烈,“君”的民族属性显得非常突出,这就给此一时期爱国思想注入了极浓的忠君色彩。但是,君除了作为国家的象征外,还具有民族属性、个体属性,这就决定了忠君思想必然具有多面性:作为国家的象征,忠君与爱国密不可分;作为民族意志的凝聚点,忠君往往又成为民族矛盾激化之源,而其个体属性的存在,就更可以说是破坏民族融合、团结的巨大阻碍。如何看待忠君问题呢?应该承认,忠君思想是传统爱国思想的一大内容,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是起过巨大作用,但同时又必须看到,“君”的民族性、个体性又曾极大地阻碍过民族融合的步伐。忠君思想是历史的产物。

再次,此时的爱国思想中已经酝酿着向近代蜕变的因子。宋代理学的阐幽竟玄,将中国思辨哲学推到一个更高的层次,“正统”、“君臣”、“道”等理念内涵的揭示不断深入,以此为基础,催生出的崇道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突破了忠君的局限,将“道”置于“君”之上,爱国思想与“道”的结合,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。在“道”的烛照下,“愚忠”得以显形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随着对“道”的认识的深入、心学的发扬光大、圣贤观的普泛化,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,“道”从圣贤普泛为寻常百姓,从而刺激民主意识的诞生和发展,宋元之际民主思想已经出现,经明、清“异端”们不断发扬光大,在近代社会到来之前,已有了一定的规模,成为近代民主思想的前奏曲,为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作了铺垫。

第三阶段。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,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折,开始由封建社会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。我们称此一时期的为爱国思想的“高涨时期”。这一时期的爱国思想也与时代相呼应,有以下几方面特征:

首先,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意识空前高涨。在第二阶段民族矛盾冲突过程中,各朝统治者都实施了不同的民族政策(如元朝的隔离政策、明朝的“长城”政策、清代的安抚政策等),以不同的方式探讨着民族政策的最佳途径,这些政策的实施有成功有失败,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出民族政策的经验,同时,民族政策的实施,也在事实上加强



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,增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。因此,到清代时,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在处理民族问题时,都有了切实有效的方法,统治者以德怀远,各族人民和睦如同一家。虽然偶有民族分裂分子从中作祟,但并不能阻隔各族人民的友谊,也不可能动摇民族融合的整体观念。这时的民族“叛乱”与第二阶段民族政权的分立,有着根本性的差别。“叛乱”这一论断能为各族人民接受,本身就已说明“叛乱”的不得人心,昭示着必然受到谴责并最终失败的命运。

其次,爱国与反抗侵略、救亡图存的思想紧密相连。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凝聚成为整体的过程中,除内在的民族融合的巨轮不可逆转外,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“外侮”的促进作用。明代倭寇侵扰东南沿海,戚继光“鼙发电举,屡挫大寇”,^①组织各族儿女保家卫国。西方侵略者将魔掌伸向澳门,更激起了全国人民团结御侮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。爱国思想开始由“兄弟阋墙”,转向“外御其侮”,中华儿女团结一心,枪口一致对外,为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而奋起打击侵略者。而在与列强的浴血奋战过程中,各族人民的友谊极大地增强,各族人民空前团结。

再次,出现了明显的传统爱国思想向近现代爱国思想过渡的痕迹。传统爱国思想的局限性(后面将具体展开)已基本突破,历经几千年的融合,终于出现了各族大团圆的局面,“夷夏之防”虽有余波,但在抵御外侮的洪流中,逐渐淡化并最终消亡。“国家”观念也获得更新。忠君思想的羁绊渐被摆脱,民主意识不断增强,爱国思想表现出忠于民族、忠于人民的特色。在当时诗人的作品中,常常把矛头指向清朝最高统治者,有着强烈的反封建倾向。这些既可以说是传统爱国文学的继续,也可以说是其发展和进步。它说明近代爱国主义文学已注入了新的血液,使传统爱国主义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。它是中华爱国文学的高峰,沿这样的轨迹向前发展,即是现代爱国主义的雏形。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,本书以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为重点,进行较为详备的阐述和论证。

二、传统爱国思想的局限性

必须注意的是,传统爱国思想是有着严重局限性的。指出这些局限性,加深对传统爱国思想的理解,有利于更有效地把握爱国思想发展的脉络,理解爱国思想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和转变,是清理传统爱国思想必不可少的工作。

首先,是“夷夏之防”的问题,也就是历史过程中的民族问题。狭隘的民族思想和

^① 《明史·戚继光传》。



大汉族主义是两种代表性的错误倾向。应该看到,民族矛盾是历史事实,更应该看到,民族矛盾是事实的历史,是历史一定阶段的产物,并不是历史的全部。同时,还应该看到,民族矛盾最终的结果是民族融合而非民族分裂。这是我们分析民族问题之前,必须澄清的两个前提。用非历史唯物观去分析问题,笼统地以古概今或者别有用心地“古为今用”,是极端错误的;对此问题置之不理,采取鸵鸟政策,自欺欺人,也非科学的态度。

在讨论“夷夏之防”之前,首先应该明确一点,就是“夷夏”并非一个确定不变的概念。即以华夏族言,一开始也是以“夷人”或“夷族”的面目出现的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云:“舜生于诸冯,迁于负夏,卒于鸣条,东夷之人也。文王生于岐周,卒于毕郢,西夷之人也。”舜、文王,华夏族的始祖,也被后世的汉族尊为祖先,然而他们竟是“夷”人!夷、狄在最初并不含贬义。只是在汉族文化显示出高势能文化之后,那些缺乏远见的汉人产生了大汉族思想,才人为地赋予“夷”、“狄”以贬义。在这种偏见之下,特别是在爱国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,民族思想与忠君观紧密相连,华夷之分曾给民族融合带来极大的阻碍。但是,随着民族融合步伐的迈进,随着忠君观的被突破,“华夷”观也超越了民族情绪,更多地赋予了文化的内涵。清初王夫之曾说过:“吴楚浙闽,汉以前夷也,而今为文教之藪;齐晋燕赵,唐隋以前之夏也,而今之椎钝驽戾者,十九而抱离心矣。”^①他又进一步分析道:“三代以上,淑气聚于北,而南为蛮夷。汉高祖起于丰沛,因楚以定南下,而天气定于南……天气南徙,而匈奴始强,渐与幽并冀雍之地气相得。故三代以上,华夷之分在燕山,三代以后在大河(黄河)。”^②清代学者黄宗羲也说:“秦汉之时,关中风气会聚,田野开辟,人物殷盛;吴楚方脱蛮夷之号,风气朴略,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。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。”^③可见王夫之等人,已经超越民族界限去认识“华夷”问题,将华夷之分定在“文教”与否上。黄宗羲兼文化与经济而言之,用今天的话来讲,就是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角度来考虑夷夏之分及其发展变化。清代学者的这些观点,符合历史实际,很值得我们借鉴。同时,他们的这些观点本身已充分证明,至迟到清代时,华夷之别已经超越了民族界限,具有文化特性而不再具备任何民族特性,所谓“华夷”是一种文化界说而非民族界说。清代末期直到近、现代,各族人民团结一心,在共同救亡图存、振兴中华的过程中,进一步加深了友谊,“华夷之防”中的“夷”不再指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任何部分,而是专指入侵列强。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一语中,

① 《思问录·外编》。

② 《读通鉴论》卷十二。

③ 《明夷待访录·建都》。



两用“夷”字,都是指西方列强而非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任何一员,即是明证。

澄清了“华夷”关系,那么,所谓的“华夷之防”也就不辨自明了。今天,在各民族空前大团结的时代里,各族人民亲如兄弟,再谈“华夷之防”或以此为借口而别有用心,是不得人心,也是极端愚蠢的。我们在清理传统爱国文学史时,应该正视这一爱国文学中的历史现象,同时更应该清晰、透彻地分析这一现象,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问题、分析问题。

其次是忠君。应该看到,君是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,它在维护封建社会统一中是起过一定作用的,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处于上升阶段,其作用是相当大的。即使到封建社会鼎盛时期,“忠君”思想与爱国、爱人民思想往往既相矛盾又相统一。如有人认为,“杜甫的‘忠君’,不但同他的爱祖国的精神分不开,也同杜诗的人民性分不开”,正是在“忠君”思想的支配下,杜甫“终其一生没有安心做地主的倾向”,这是他“最伟大之处”。^①话虽偏激一些,也有一定道理。但是,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,“君”本身的局限性却又使其对爱国思想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。“君”的民族属性给民族融合带来阻碍,“君”的个体属性中“昏”的一面,又成为百姓苦难之源。在民族矛盾和冲突过程中,忠君思想的局限性对民族融合曾起过不利的影响;在封建社会后期又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,特别是阻碍民主思想的萌芽和生长,对爱国思想的发展极为不利,由忠君思想派生出来的愚忠,更可以说是传统爱国思想中的一个怪胎。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清理传统爱国思想时应该批判、扬弃的。

这里,还有必要澄清一下“忠君”里“忠”字的含义。孔子曰: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。”^②又说:“所谓大臣者,以道事君,不可则止。”^③“子路问事君,子曰:‘勿欺也,而犯之。’”^④朱熹《集传》云:“犯,谓犯颜谏诤。”在孔子看来,君臣关系须保持大致的对等,臣对君的不是,须犯颜谏诤,而不是盲从。这就说明,在儒家思想里“忠”并非惟命是从,而是尽职尽责。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,进一步发挥道:“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,则臣视君如国人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^⑤孟子认为,臣之与君,没有地位上的悬殊,君臣之间,应该平等相待。如此理解“忠君”里的“忠”字,才能表现出忠君思想里的先进性。只是在封建集权政治不断强化的情况下,这种思想一再受到压制,未能发扬光大,反而将忠君变成惟命是从并进

① 冯文炳《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》,载《人民日报》1962年3月28日。

② 《论语·里仁》。

③ 《论语·先进》。

④ 《论语·宪问》。

⑤ 《孟子·离娄下》。



而陷入愚忠的泥潭。

还应说明的是,与君权相对的民本思想作为忠君的对立面,自古即已存在。孟子不仅把“民心”纳入了“道”,而且以民与君对比,说是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。^①汉代谷永继承孟子的观点,说:“天生蒸民,不能相治,为立王者以统理之……皆以为民也。”由此他进而推论:“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,非一人之天下也。”^②基于这样的认识,所以要“不私一姓”,不讲愚忠。当所立之君王不能管理国家,违背人民利益时,就不应唯唯诺诺,助桀为虐。这种民本思想与崇道观念结合在一起时,也就势必催生出民主思想的硕果了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便是一位将崇道与爱国相结合的爱国志士,在《日知录》中他以“明道”为宗旨,提出了“保天下”的命题:“有亡国,有亡天下。亡国与亡天下奚辨?曰:易姓改号,谓之亡国。仁义充塞,而至于率兽食人,人将相食,谓之亡天下……知保天下,然后知保其国。保国者,其君其臣;保天下者,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!”这就是被后人浓缩为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经典名言。他把“道”从宋元道学家那里解放出来,发扬陆九渊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的心学思想,将“道”下放给全体民众,给了“匹夫”。对宋元理学家们争论不休的凡圣之别问题,作出了新的论断:凡圣之别并非问题的关键,是否以天下为己任,是否行仁义之道,才是根本。于是以崇道为指归的中华爱国主义才逐渐成为全民的共识。将崇道与爱国结合,铸造了一种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,超越了忠君的层面。

由此可见,在忠君的思想中,早已孕育着超越这一层面的因素。忠君思想只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产物,不可能永恒地存在下去,在民本思想发扬之后,在民主政治产生之后,封建君王必然跟封建制度一起退出历史舞台。我们清理传统爱国文学史时,对历史上那些带有忠君色彩的作品,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,用今人的眼光去批判,汲取其爱国的精髓,而剔除其不足。

三、传统爱国文学的两大主题

这里再就传统爱国文学的两大主题作些介绍。

首先,报国之志。这可以说是爱国文学的主旋律。但是,也应该看到,古人的报国之志往往与个人的功名之心结合在一起,对此,我们也不能轻易排斥。中国早在春秋时代就有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”的“三不朽”的说法,它构成了古

^① 《孟子·尽心下》。

^② 《汉书·谷永传》。



代士人的价值观。汉代终军的“请缨”，班超的投笔从戎，都带有功名思想的色彩。班超少时就说：“大丈夫无它志略，犹当效傅介子、张骞立功异域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事笔砚间乎？”^①后来他通西域，立下奇功，被封为定远侯。后世不少爱国者，常以班超为榜样，投笔从戎。到了唐代，破坏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，庶族寒门出身的子弟，也能“学而优则仕”，以自己的才能进行公平竞争（只能是相对的），于是建功立业，报效祖国，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，成为时尚。在大诗人李白身上，报国与立功的愿望十分强烈，他在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》中说：“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，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，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。”^②李白以浪漫主义的手法，抒写了“济苍生”、“安社稷”的爱国理想，热情地向往为国建功立业的不平凡的生活。在盛唐这种积极进取的热烈气氛中，不少男儿志在四方，争上前线。王之涣、王昌龄和高适、岑参等人，或请缨报国，或送人出塞，写下了许多格调高亢、斗志昂扬的从军行和边塞诗，成为盛唐诗歌的主旋律、时代的最强音。对于这些优秀的诗歌，我们不能因为其中含有个人功名的因素而加以贬低。人人皆生活于现实之中，个人的利害关系不得不有所考虑，所以在报国之中建功立业，并不足为怪。但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：即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把个人的利益放在首位。传统爱国文学中的文人们都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，他们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，在个人利益妨碍国家利益之时，都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，为国捐躯，视死如归。

第二，忧患出诗人。早在春秋时代，忧患意识即已萌芽。孔子说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又说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”^③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……君子忧道不忧贫”，^④“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”，^⑤可见孔子的忧患带有儒家文明的理想，要使国家人民修德讲学，变成人人平等的仁义之邦。至孟子，则认为忧患可以全身保国，一个国家，往往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，“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”，^⑥是以“尧以不得舜为己忧，舜以不得禹、皋陶为己忧”，^⑦认为所忧者是要得贤臣辅佐，治理国家，这才是当务之急。孔、孟两位大儒为中华传统的忧患意识奠定了理性的基石，给中华爱国主义树立了崇高的准则，后世爱国者无不奉之为圭臬而身体力行。战国末期的屈原是如此，汉代的司马迁、董仲舒也是如此。唐宋时代

① 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。

② 《李太白全集》卷26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，第1225页。

③ 《论语·述而》。

④ 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

⑤ 《论语·季氏》。

⑥ 《孟子·告子下》。

⑦ 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。



是忧患意识高涨的时代,也是爱国诗文发达的时代。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,人民颠沛流离,杜甫高呼“穷年忧黎元,叹息肠内热”,^①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得欢颜!”^②即使身处困境,四处漂泊,杜甫也很少考虑个人的安危,而是将国家的命运,人民的苦难放在胸中,无时或释。宋代的范仲淹上承孔孟、杜甫,下启程朱理学,“每感激论天下事,奋不顾身,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”,^③莫不受其沾溉。在《岳阳楼记》中,他对传统的忧患意识作了高度的概括: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,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得乐耶?其必曰: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乎。”这种忧患意识超脱了个人的利害关系,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不管在朝还是在野,总是把人民和国家放在心上。这里的“忧其君”,固然带有忠君的因素,但其主导方面仍是忧国。

近代以来,爱国者的忧患意识更为强烈。龚自珍便是其中的代表。他在《逆旅题壁》等诗中以“秋气”、“夕阳”、“暮霭”喻社会的衰微,而统治者对普遍潜伏着的危机全然不觉。在《尊隐》一文中还指出“日之将夕,悲风骤至”,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忧惧心情。梁启超说:“龚魏之时,清政府既渐凌夷衰微矣,举国方沉酣太平,彼辈若不胜其忧危,恒相与指天划地,规天下大计。”^④说明龚自珍、魏源这些先知自觉的爱国者的忧患意识,是为“世情民隐”而发的,他们为国家的命运、人民的生活而忧愤不安,并积极寻求出路,规划“天下大计”。在忧患的同时,还考虑提出改革的主张,这又比范仲淹前进了一步。

爱国主义的内涵极其丰富,涉及的主题也很多,以上所论,是取其中有分量的两大部分。他如关心民瘼、对祖国山河的热情歌颂等,也都是中华爱国文学史上的良好传统,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。总之,爱国主义是中国文学史的一大旋律,但也难免出现一丝不和谐的杂音。我们撰写此书,旨在弘扬爱国主义的主旋律,排除杂音,鼓舞炎黄子孙同心同德继承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,保卫领土与主权的独立与完整,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。

此书属于全国“九五”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项目,由于历史较长、内容较广、问题较多,经过七位同志将近十年的努力,至今方始完成。在编著过程中,我们广泛地参阅了有关的资料,并汲取了一些前人和今人的有益见解,大都注明出处,间有未到处,尚祈见谅。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有关领导帮助申请项目,并时时加以督促;学

① 《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》。

② 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。

③ 《宋史》本传。

④ 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二十二《清代今文学与龚魏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,第76页。



术界许多师友也热心关注,特别是明代文学专家夏咸淳研究员对本书明代部分详加指导,谨此致谢。在本书统稿过程中,罗立刚同志热情相助;责任编辑沈洁同志在审稿时也提供了宝贵意见,谨志于此,以示不忘。然而由于水平所限,书中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欠妥之处,敬希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赐予指正。

2005年3月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


目 录

导 言 / 1

第一编

传统爱国文学的萌芽与成长期——上古至南北朝

第一章 孳生爱国思想的土壤——上古文学中的爱国色彩 / 3

第一节 概说 / 3

第二节 原始氏族社会中爱国思想的萌芽 / 4

第三节 夏商时代爱国思想的逐渐形成 / 7

第二章 《诗经》中爱国思想的成长 / 12

第一节 概说 / 12

第二节 周人的史诗 / 13

第三节 爱国思想的多元化 / 17

第四节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女诗人 / 20

第五节 黍离之悲 / 22

第三章 历史散文中错综复杂的爱国思想 / 24

第一节 概说 / 24

第二节 《春秋》与《左传》 / 24

第三节 《国语》与《战国策》 / 29

第四节 《山海经》与《禹贡》 / 33

第四章 诸子散文中所呈现的爱国思想异彩 / 36

第一节 概说 / 36

第二节 晏子与管子 / 36

- 第三节 孔子与墨子 / 39
第四节 庄子与孟子 / 42
第五节 荀子与韩非子 / 45

第五章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/ 49

- 第一节 概说 / 49
第二节 《离骚》 / 51
第三节 《九章》与《九歌》 / 54

第六章 两汉大一统时期的爱国文学 / 58

- 第一节 概说 / 58
第二节 西汉散文中的爱国思想 / 60
第三节 歌颂祖国繁荣富强的汉赋 / 62
第四节 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 / 66
第五节 汉代诗歌中的爱国情思 / 74

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爱国文学 / 80

- 第一节 概说 / 80
第二节 建安文学中的忧国忧民 / 82
第三节 晋代文学中的爱国情怀 / 92
第四节 南朝文学中的爱国内容 / 102

..... 第二编

传统爱国文学的成熟期——隋唐到清中期

第一章 隋唐时期的爱国文学 / 125

- 第一节 概说 / 125
第二节 充满豪情壮志的初唐诗文 / 127
第三节 盛唐诗中的爱国思想 / 134
第四节 李、杜诗文中的爱国思想 / 142



- 第五节 中唐时期的忧患之思 / 151
- 第六节 中唐时期的爱国散文 / 157
- 第七节 杜牧、李商隐诗歌中的爱国思想 / 162
- 第八节 晚唐其他爱国诗人的黍离之悲 / 170
- 第九节 唐五代词中的爱国情结 / 173

第二章 北宋的爱国文学 / 179

- 第一节 概说 / 179
- 第二节 宋初的爱国文学 / 180
- 第三节 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舜钦、梅尧臣 / 183
- 第四节 王安石和苏轼 / 190
- 第五节 北宋中、后期的爱国文学 / 196

第三章 南宋爱国文学的深化 / 200

- 第一节 概说 / 200
- 第二节 南宋初年的爱国文学 / 201
- 第三节 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以及杨万里、范成大 / 209
- 第四节 辛弃疾及辛派爱国词人 / 218
- 第五节 “江湖”诗人的沉郁之音 / 228
- 第六节 文天祥等宋末爱国诗人及遗民诗人 / 234

第四章 金元时期的爱国文学 / 250

- 第一节 概说 / 250
- 第二节 元代的杂剧 / 252
- 第三节 金元两代的爱国诗文 / 261
- 第四节 词、曲及话本(附南戏) / 274

第五章 明代的爱国文学 / 280

- 第一节 概说 / 280
- 第二节 明初的爱国诗文 / 281

- 第三节 明代中期的爱国诗文 / 286
第四节 明代后期的爱国诗文 / 301
第五节 明词中的爱国思想 / 311
第六节 明代的爱国戏剧 / 317

第六章 清代的爱国文学 / 322

- 第一节 概说 / 322
第二节 清初遗民的战歌 / 323
第三节 清代中期的爱国诗歌 / 337
第四节 清代前中期的爱国词 / 345
第五节 清代的爱国戏剧 / 353

第三编

传统爱国思想的高涨期——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

第一章 封建末世启蒙作家的爱国思想 / 365

- 第一节 概说 / 365
第二节 龚自珍 / 366
第三节 魏源 / 369
第四节 林则徐 / 372

第二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潮 / 376

- 第一节 概说 / 376
第二节 张维屏 / 376
第三节 张际亮 / 379
第四节 陆嵩 / 381
第五节 朱琦 / 383
第六节 鲁一同 / 384
第七节 姚燮 / 386
第八节 黄燮清 / 388